

天道中行

邓小平的理论思维

曲庆彪 等著

天道中行

邓小平的理论思维

DENGXIAOPINGDELILUNSIWEI

□ 曲庆彪 马桂萍 鲍雪松 著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 大连 ·

©曲庆彪 20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道中行——邓小平的理论思维/曲庆彪等著. —大连:辽宁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652-0066-3

I. 天… II. 曲… III. 邓小平理论-研究
IV. ①A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0769 号

出 版 人:程培杰
责任编辑:张来胜 朱媛凤
责任校对:朱 章
封面设计:李小曼
版式设计:李小曼

出 版 者: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大连市黄河路 850 号
邮 编:116029
营销电话:(0411)84206854 84215261
印 刷 者:大连金华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70mm×228mm
印 张:14
字 数:255 千字

出版时间: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52-0066-3

定 价:36.00 元

前言

开启新时代的伟人哲思

回眸 30 年前,人们不难理解十年浩劫后仍旧贫弱的中国所处的历史语境,也不难设想中国人所面临的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困惑。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掘开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泉源;一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叩问,成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解之题。30 年来,邓小平的理论思维一直贯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涵容着惊世勇气与高卓智慧,使人们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特殊时刻,无法不感慨伟人哲思的力量。

康德曾说:“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开始于感性,然后进入到知性,最后以理性告终,没有比理性更高的东西了。”恩格斯也曾精辟地指出,“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自古及今,人们对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一些具体规律、类规律的认识已达到极致,而对大规律、总规律的把握却十分有限,对事物内涵的基因组合、事物背后的演进模式尚缺乏透彻的了解。这就造成了人类社会前进过程中的委顿或僭越,要么丧失机遇而落后于时代,要么不计后果而超越了现实。中国百多年来的曲折道路,不正印证了理论思维的缺失吗?因此胡锦涛才会强调:“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

我们所探讨的理论思维,是对操纵社会前进方向、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规律的理性把握,即对万事万物中所蕴涵的具体规律、类规律和总规律的高度抽象与概括。它基于对纷繁世相之上的秩序感与统一性的深刻感知,是分清事物的现象与本质、主流与支流、量与质、个别与一般的重要思想工具,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简言之,即哲学。

时代变化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哲学,哲学是思想中所能把握到的时代。无论是作为过程还是作为结果,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理论思维在时代发展中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把握历史的进程,辨明社会发展的方向,就应具备高超的理论思维能力,超越现实而观照现实,洞察规律而驾驭规律,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洞开一扇理论之门。

“舒之弥宇宙,卷之不盈分。”理论思维与“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古典哲学范畴“道”一样,“惟恍惟惚”,“唯变所适”,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准确把握、舒卷自如的。在积习深重、局势复杂的20世纪70年代末,耄耋之年的邓小平是如何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思维进行创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邓小平的理论思维又呈现出怎样的风貌呢?

其一,他凸显人本理念,形成了务本求实、富国强民的发展思维。

哲学不仅仅是一种慎思明辨的理性,而且是一种体会真切的情感;不仅仅是一系列概念的运动和发展,而且蕴涵着极其深刻的生活体验。“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从这句流传甚广的心声,可以看出邓小平的理论思维中浸透的是忧国爱民的热切情怀,他全部的理论思维都有一个感性的起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千方百计让数亿中国人吃得饱、穿得暖,过上小康生活。探讨邓小平理论思维的过程与结果,决不能忽视这样一个朴实的

起点,因为正是有这样一个起点,才使他在日理万机中寻大是、求大理、重大情、谋大利,不搞概念的争论,不陷进“姓资姓社”的辩驳,不留恋以往的“革命思维”,不惧怕和拒绝新生的、外来的各种事物,而是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肯定了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喊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时代最强音。

邓小平关于人民利益和生产力的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对改革开放具有最直接、最根本的指导意义。他正确定位了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阐释了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出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他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制定“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制度、体制和政策的新设计、新安排、新选择,使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

其二,他弘扬民族特色,形成了不偏不倚、中正协调的辩证和谐思维。

对中国人来说,“和”是古典哲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是君子人格与哲理思想的最高境界。在自然与社会中,万事万物组成一个个不同的系统,按一定的秩序运行。所有的事物又在一个大的系统内保持着复杂而微妙的平衡,并因系统的存在及系统动力的作用而不断上升为新质,产生质的飞跃。“和”的理念,就是要在系统内寻求合作、协同,保持多元性整合、多样性统一。

五千年文化浸润滋养,邓小平对“和”的理解和运用不着痕迹而又随处皆在。邓小平的理论思维的整体寓意就是“和”,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工程,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整体合作、共同繁荣,是纵横世界、面向未来的具有广阔时空观念的总体战略。他一向注重对大局、大势、大方向的把握,强调协调性,抓住整体性,紧扣全面性。他大胆地将

似乎不可能加以组合的要素排列组合起来,形成了综合思维,同时注意在事物发展的质与量之间把握最为切中的关节点,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在一个无所偏倚、无所乖戾的“度”内,形成了中和思维。综合思维与中和思维概括起来就是包容差异、和谐共生的辩证思维,也是求同存异、不失中正的辩证思维。它极具理论智慧和操作价值,对走出“一大二公三纯”的僵化观念,对避免忽左忽右、畸重畸轻的错误路线,对克服“革命思维”、斗争哲学的偏执等等都起到重要作用,形成了国际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共处与合作的共进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理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前提下承认文化的多样性,等等。事实证明,在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必须选择辩证和谐思维来处理国内国际事务,必须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

其三,他把握时运机缘,形成了因应灵活、融通无碍的通变思维。

“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猫论”生动而形象地反映出他的思维特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非常典型的通变思维的成果。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中的这句话,揭示了事物发展的一种处变状态和顺应事物发展的通变规律。客观上一切“变动不居”,主观上就要一切“唯变所适”。通变思维蕴涵着思维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不是单向度的线性思维,而是同综合与中和相联系、相统一的球面立体思维,在最大程度上把握了事物发展的内在机理。

最灵活的人最能掌握大局,在邓小平诸多谈话和决策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洞烛物情、因应咸宜的灵活态度与适应能力。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他从变化

了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变化了的实际情况里重塑具体的时空观念,提出以改革助推中国发展的新思路。这种把握时机、以变应变、究其因缘、纵横捭阖的改革思维,实为一种高超的创新与发展智慧。以此为指导的改革开放,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多维、立体的过程。诚然,它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却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对传统经济体制的变革,并带动了其他体制的变革,是社会主义总的量变过程中阶段性的质变,因而成为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境界。

其四,他立足整体积淀,形成了兼收并蓄、继往开来的扬弃思维。

人类文明的进化演变,体现为无限复杂的流质在有限的时空河床上的整体推进。社会形态的变化不能凌虚蹈空,绝不是 在别的“空地上”建立的与原来迥然不同的异体替代品,只能是裹挟着整个社会遗传基因的一体蝉蜕的生命更新。邓小平神清思澈,对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纯化自身道路会越走越窄,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同人类的其他文明成果对立起来的自我孤立化的倾向,只能形成新的闭锁与衰微。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必然要立足于社会发展的整体积淀,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精华,朴实而自信地实行“拿来主义”——扬弃。

纵向上,扬弃人类社会的文明遗产并进行提升和构建。尽管原来的基础是陈旧的,矛盾的,应该被否定的,但旧事物的内在矛盾形成该事物的对立同一(马克思语),同一体的对立双方都为对方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黑格尔语),这就形成了事物发展中的悖论。悖论的整合与扬弃,形成更高质态的新事物,建立起社会新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是中国革命与发展道路抉择的典范,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

的逻辑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承袭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精华,又弥补了它在某些方面的不足,展现了继承传统、提升现实的迷人风采。

横向上,借鉴其他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优长。这并不是说不分良莠地照单全收,也非不看时机地生搬硬套,而是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转换的有力参照系,站在资本主义肩上,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邓小平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科学分析,打开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联结的思维通道,指出计划和市场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共存性,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更高内涵,扩展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空间维度,开拓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全新境域。

正是基于社会发展积淀论,基于站在资本主义肩上发展的扬弃思维,中国的改革才成为一场整体的、上下兼通的变革,成为不亚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场新的社会革命。

其五,他洞察时代主题,形成了纵横时空、舒展如虹的创新思维。

邓小平的理论视阈十分广阔,深度契合时代精神,表现出创新和超越的思维特征。他敏锐地觉察世界各种制衡关系的存在,战争威胁并不是中国所要应对的迫在眉睫的主要矛盾,和平与发展才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因而果断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要发展就要全面创新,尤其是理论、观念上的创新。譬如,他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发展了生产力的内涵,推动整个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风,促使党和国家制定了科教兴国的基本方略。又如,对于如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在解决香港和澳门回归问题上取得了成功。他还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论断,把全社会的力量

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来。

邓小平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发展社会主义的诸多新观点,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达到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的制高点,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和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考量邓小平理论思维的当代价值,最重要的就在于它实现了自限解脱,完成了社会主义的生命更新。自限,是一种尤为牢固的障壁,其可怕之处在于不自知。就如一道道玻璃幕墙,看起来并不存在,却实实在在地阻挡着我们向理想(这里所说的理想是现实积累的提示方向)的目标迈进。这种自限体现在很多方面,如思想观念上的,目标方向上的,功能定位上的,时间空间上的,风格特色上的,等等。思维的最大力量是战胜自己,“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要寻求自限解脱,就要抑制自我、反思自我、战胜自我,超越历史与现实的障壁,弥纶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鸿沟,以系统的辩证和谐思维提升对立统一的矛盾学说,真正回归于马克思的对立同一哲学观。康德在1784年写的《什么是启蒙》中说:“启蒙就是使人脱离未成熟状态,把人从迷信或偏见中解放出来。”邓小平的理论思维对中国共产党人及全体国民来说,就是一次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再启蒙。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因此,他涤除“革命思维”与斗争哲学的局限,冲出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拘囿,从对以往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眷恋中解脱出来;打破思想僵化的局面,释放了人的个性和

创造力；凿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壁垒，从人为设定的圈圈框框中解脱出来。

这种不拘一格、顺应规律的自限解脱，使改革开放30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将传统社会主义的基础、资本主义的优秀因子与当代中国的需求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形成了具有伟大历史地位和现实指导意义的邓小平理论，催生了日臻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就了厥功至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大步跨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国际化的新时代，经济总量走向世界前列，民生状况步入总体小康水平。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挺起了脊梁，走向科学发展的新时代，再次解放思想，以人为本，掀开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新篇章。

邓小平的综合思维、中和思维、发展思维、辩证和谐思维、通变思维、扬弃思维、创新思维，渊源于中国五千年文明，根植于当代伟大实践，对我们把握中国现代社会的总体特征以及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本书抓住了邓小平理论思维的神髓——实事求是，从综合与中和认识的制高点出发，深入系统地探讨了邓小平的社会发展基础论、社会主义改革论、市场经济思想和社会发展积淀论等，融合了十几年来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心得，吸纳了整个团队尤其是年轻的学术骨干的力量，其中不乏大胆的理论新见。谨严与厚重是我们一贯的追求，但个人和团队永远会有自己的“自限”，永远需要“自限解脱”。我们诚挚地希望以书中不成熟之处就教于方家，与同行和读者共同进步。

目 录

1 | 前 言

1 | 第一章 实事求是与自限解脱

- 一、中国传统文化视阈中的实事求是
- 二、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阐释
- 三、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的创造性发展

28 | 第二章 综合与中和认识的制高点

- 一、邓小平综合思维的确证
- 二、由综合思维向中和思维的跃升
- 三、邓小平综合与中和思维的当代价值

55 | 第三章 社会发展基础论

-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母题
- 二、毛泽东生产力思想的悖论
- 三、邓小平的生产力思想

90 | 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革论

- 一、作为理论思维的革命、改革与改良
- 二、涤除“革命思维”和“斗争哲学”
- 三、邓小平的改革观

126 | 第五章 站在资本主义肩上的发展

- 一、扬弃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 二、社会主义公与私的互为贯通
- 三、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的基本点

163 | 第六章 社会发展积淀论

- 一、社会发展的历史继承性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
- 三、邓小平社会发展积淀论

205 | 参考文献

212 | 后 记

第一章 实事求是与自限解脱

理论思维的成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真正成熟的标志。英国的商业法律之术,法国的文学艺术之论,美国的科学民主之理,德国的哲学管理之用,都是理论思维在支撑。因此,一个国家和民族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缺少理智的、现实的、科学的理论思维,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将在行进中迷失方向,甚至会误入歧途。“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①以 1978 年为肇端的中国改革开放,经过 30 年波澜壮阔的历程,使中国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民生状况由半饥饿状态到小康水平,社会发展由严重扭曲到总体和谐,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印证了一个国家的兴旺发展、一个民族的复兴一刻离不开理论思维,中国的巨变也一刻没有离开理论思维。同时,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465 页

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巨变又与邓小平的名字紧密相连,邓小平被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邓小平拥有高超的理论思维能力。邓小平的理论思维贯穿并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以及与之相联的自限解脱是邓小平理论思维的内核。走进伟人邓小平的思维世界,也就能深刻地领悟和体味着中国鲜活的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并由此憧憬着一个东方大国的复兴。

一、中国传统文化视阈中的实事求是

历经了多年“左”倾思想以及僵化的思维方式的束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着种种问题和困难,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几乎处在一个极为艰难的时刻。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率先垂范,抵制、克服“左”的思想,并最早从僵化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而当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新的思维方式带领中国前进时,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和困难也逐步得到解决。

当我们提及“实事求是”这一概念时,总是想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总是联系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今天,“实事求是”一语已经被内化为一个政治术语,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研判“实事求是”,这一概念有不同的含义,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术语。“实事求是”一词是地道的本土语言,但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在毛泽东、邓小平那里,“实事求是”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地演进。诚如黑格尔所说,“同一句格言,在成年人那里和在小孩那里,其含义是不同的”,因为成人与小孩对生活的阅历不同,体验也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人,在其童年、青年、中年、老年阶段,也因生活阅历不同,对格言的领悟也不尽相同。所以,在不同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实事求是”的含义在发生着

变化。

第一,“实事求是”一词最早见于中国典籍,古义是治学严谨。在国外历史文化典籍乃至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未见“实事求是”一词,“实事求是”一词最早为中国人所用。作为地道的中国语言,“实事求是”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其中说道:“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中国古籍中的“实事求是”用以比喻古人治学严谨,指的是求实、求真、实证的治学态度。最初用来形容治学严谨的河间献王刘德。刘德是汉景帝之子,封在河间,为河间王,卒谥“献”,故称“河间献王”。秦朝曾发生“焚书坑儒”事件,致使先秦古文书籍大量流失或毁灭。刘德一生爱好藏书,尤其爱好收藏先秦古文书籍,他砥砺前行,身体力行,闻民间藏有先秦古文典籍者,则亲自前去重金收购,而且他总是在购书时派人将书籍重抄一份,留与民间百姓。刘德如此珍视先秦古文典籍,是难能可贵的。“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①,于是刘德贤名远扬。

刘德一生收集了很多先秦时期的古文典籍,注重鉴别典籍文本的真伪,并对其精心整理。他收藏古书、研读古书、考证古书、整理古书,脚踏实地,治学严谨,刻苦钻研,实事求是。由此,刘德成为汉代很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由于当时刘德在政治、思想上的影响力,班固在编撰《汉书》时为河间献王立传,并在传的开头对他的治学精神作了高度评价。班固赞扬刘德在古书收集、整理和研究中的求真、求实精神,他说:“河间献王刘德以汉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① (汉)班固:《汉书》卷53《景十三王传》

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可见刘德爱好先秦古代文化，对先秦古代文化的研究十分认真，总是在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以后，才从中求得正确可靠的结论来。

追溯历史，可见，在班固编撰的《汉书》中，“实事求是”的本义为治学严谨，这与今天政治语境下的“实事求是”的内涵相差甚远。尽管如此，“实事求是”中求真、求正、求实的精神实质一直延续着。

第二，从西汉末到唐代之后，“实事求是”已经不再停留在概念的释义上，而成为一种求实、求真、实证的学风，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汇。

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求实、求真、实证的学风，是在西汉末年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争论中逐步形成的。儒家经典在汉代流传过程中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不仅存在用什么字体书写的问题，而且存在文字释义、观点和看法有歧见的问题，并由此形成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汉代末年兴起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争论，并逐步走向尖锐，其中古文经学家在与今文经学家争论时所坚持的正是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例如，古文经学家在治学方法上特别重视训诂，即重视解释古代词语的本义，努力寻求先秦古文的本来含义，不作无根据、无事实的推断。东汉古文经学家许慎撰写《说文解字》，对9000多个文字的形、音、义作出解释，全书总计13万多字。在两汉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争论中，一批经学家恪守“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由此，以治学严谨为内容的“实事求是”发展为士人的一种求实、求真、实证的学风。

进入唐代，精通经学的学者颜师古提出，“务得事实，每求真一是也”。这里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真实情况。这里的“是”不